



## 一、研究動機

咸豐十一年（1861年），鑑於對外交涉事務日趨繁雜與各國駐京使節、開放口岸的逐日增加，為了便於處理對外事務，清廷遂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下簡稱總理衙門、總署），綜轄關於外國的一切政務，此係中國首次設有官署辦理外交之開始；惟就外交的嚴格意義上來說，總署並非單純的外交機關。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華北爆發庚子拳亂，導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次年，清廷與各國訂立《辛丑條約》，其第十二款條文內明訂須改革總理衙門，清廷遂依約著手改組總理衙門，並在這基礎上創設了外務部，中國外交逐漸轉型為近代外交模式。外務部成立後，組織體制歷經數次更迭與改革，在

短短十年內，由原先總理衙門專理洋務的體質，逐漸轉化為具備近代化意義的專業外交機關，幾近於當代各國外交機構之機能，其鼎革與成就著實超越了總理衙門四十年間的努力。然而，清廷終因中央威信的低落、地方督撫的分權以及國內危機紛至沓來等諸多因素，最後招致了政權覆滅的結局，外務部的職能旋即遭民國的外交部取代，而漸漸為人所遺忘。

過去，兩岸學界有關於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受到外在環境與時空的制約，有過幾個起伏的階段，<sup>01</sup>皆不免受到諸如民族情感、黨派認同或西方中心觀等因素影響。<sup>02</sup>而在近代外交組

- 
- 01 關於國外與海峽兩岸近代中外關係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與研究成果，可參閱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47-72；王建朗、鄭永慶，〈中外關係史〉，收錄於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250-284。
- 02 例如，早期劉彥和錢亦石的作品多基於民族情感而作，此乃外在環境使然；而丁名楠、胡繩和王紹坊等作品則難脫於唯物史觀之立論；至於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則難脫西方中心論的立場。請參閱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錢亦石，《中國外交史》，（上海：生活書店，1947）；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 1840-191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張匯文等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全三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費正清原著，陶文釗編選，林海、符致興等譯，《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至於「西方中心觀」一說，則可參閱柯文（Paul A. Cohen），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陳君靜，《大洋彼岸的回聲：美國中國

織的研究上面，史學界的前輩們大多以總理衙門為主，並視其為清代外交機構之代表，直接與民國時期的外交部作一傳承，介乎其間的外務部則常被忽略，這使得中國外交史的研究承續上，產生了時代斷裂的現象。筆者認為，外務部遭到忽略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外務部存在的時間短暫（1901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外交的發展即邁入外交部的階段，許多人在研究中國外交史時，自然容易將外務部定位為介於總理衙門與外交部之間的「過渡機構」；此外，過往研究多認為清廷在此期間之對外交涉表現多係喪權辱國之舉，並無研究之價值。第二，受限於檔案史料的使用不易，<sup>03</sup>而關於清末政壇的記述亦多散佚於諸多名人傳記、私家筆記之中，在蒐尋上有其一定難度存在。第三，早期史學界對於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大都受限於時代環境制約，或難以捨棄民族立場與個人主觀情

---

史研究歷史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92-256。

- 03 外務部的檔案，原存於外務部，自辛亥革命後，即由北洋政府外交部接收，迄1949年國民政府來臺時亦將部份外務部檔案一併運來，原存放於外交部，1955年開始分批移交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現存於近史所檔案館內），其內所保存之檔案已出版者，有鐵路、礦務、教務、越南檔、朝鮮檔，未出版者有清檔；至於大陸方面於1949年後，即將外務部檔案劃歸中國科學院歷史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管理，旋調外交部查用，並於1965年移交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經整理編目後，按國別、問題原則共分為五十七類。請參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外交檔案目錄彙編》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序頁、凡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概述》，（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47。

感，往往只立足於中國本位立場而非議外國，不探討外交成敗的國際背景，不重視中國外交機構的功能，也不重視外交人員的素養和外交術，結論常為外人不講公理正義，<sup>04</sup> 這樣的結論尤以辛丑條約後的外務部為最，咸認為在外國武力脅迫下所成立的外交機構及訂立條約都是屈辱的、賣國的，故在情感上較無意願深入研究。就在諸多原因的交雜下，迄今外務部的歷史仍被人們所忽視。

筆者認為，外務部為清朝邁向西方近代化外交機關之最終形態，超越了自隋唐沿襲下來的傳統六部制度，<sup>05</sup> 不僅為清廷推行新政中最早近代化的部會，更係中國歷代以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機關，其所奠定之外交建制，諸如外交專業人才培養、海外使館、領事制度與地方交涉使司的制度化等各方面，都為民國時期的外交部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對日後中國在國際間爭取權益與國際地位，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就整體的中國外交而言，外務部實居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地位，應值得深入研究。

---

04 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52。

05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453。

## 二、研究回顧

國內外學術界對於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研究成果，早期專書方面，最重要的首推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該書成書於民國二年（1913年），原由外交部印刷處出版，內文共分為甲（舊制：總理衙門、外務部）、乙（新制：外交部）二篇，著重於各部之編制與職司條例，為研究近代外交史之必備書籍。<sup>06</sup>其次為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sup>07</sup>該書研究的對象亦橫跨總理衙門、外務部至民國外交部三個階段，對於外交行政與人事體系亦多加著墨，不過對於外務部的研究而言，僅止於部內組織、員額之介紹，前後所佔篇幅僅僅六頁。至於錢實甫《清代外交機構》，<sup>08</sup>全書共分為六章，主要討論總理衙門改組前的對外關係，對於外務部的研究僅於最後第六章第一節，所佔篇幅將近七頁，簡略地提到外務部的組織與人員，與前二書內容差異性不大；而嚴和平《清季駐外使館的建立》一書，<sup>09</sup>則為海外使領館與出使制度之重要參考著作。

---

06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商務印書館，1943）。

07 本書共分為七章，分別為總論、總理衙門、外務部、外交部、地方外交機構、外交權、使領館與人事行政等七個章節討論。請參閱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昆明：商務印書館印刷廠，1945）。

08 錢實甫，《清代外交機構》，（北京：三聯書局，1959）。

09 嚴和平，《清季駐外使館的建立》，（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5）。

2005年前的相關著作，以大陸出版品為主。在專書方面，首推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sup>10</sup>該書將中國外交制度在不同時期的狀況分為四編，其中第三編專門介紹清末十年中的外交體制改革，對於外務部則有較為詳細的論述，係研究近代外交制度與外務部重要的參考，惟其重點在於制度的變化，對晚清政壇與人事層面的探討，較為欠缺，對於外務部之解析僅偏重於制度面。其次為王開璽《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sup>11</sup>該書內容總共分為四章，主要係探討清代中外禮儀的演化、轉型的過程，於第三章第四節中以近十頁的內容檢討了外務部的成立組織與貢獻。至於梁碧瑩《艱難的外交：晚清中國駐美公使研究》，<sup>12</sup>該書對於外務部有極簡略的提及，惟內容多係參考吳成章與王立誠等人著作，故實質之參考價值不大。至於對總理衙門的探討，則當以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為代表，該書共分十章，專門討論總署的變革與得失，儘管未曾提及外務部，但仍為研究晚清外交歷程之必備書籍；而樊百川《清季的洋務新政》中，<sup>13</sup>亦將總理衙門時期

---

10 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頁175-206。

11 王開璽，《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366-375。

12 梁碧瑩，《艱難的外交：晚清中國駐美公使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頁52-59。

13 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5）；樊百川，《清季的洋務新政》第一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529-681。

的洋務推行作一介紹與評斷，相當有參考價值。

在學位論文方面，臺灣有：劉光華〈晚清總理衙門組織及地位之研究〉、陳思齊〈總理衙門設立背景暨其角色之研究〉與林玉如〈清季總理衙門設置及其政治地位之研究〉，<sup>14</sup> 均為總理衙門時期的研究；至於張齊顯〈北京政府外交部組織與人事之研究（1912-1928）〉，<sup>15</sup> 則為民國外交部時期的重要參考資料。在單篇論文方面，早期著作則有張忠紱〈清廷辦理外交之機關與手續〉、周子亞〈我國外交機構沿革考〉、劉心顯〈中國外交制度的沿革〉、劉熊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其海防建設〉、<sup>16</sup> 傅宗懋〈清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軍機處之關係〉、劉光華〈清季總理衙門的職掌〉與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等，<sup>17</sup> 以上論文多集中討論於總理衙門，少數雖提及

- 
- 14 劉光華，〈晚清總理衙門組織及地位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6月；陳思齊，〈總理衙門設立背景暨其角色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6月；林玉如，〈清季總理衙門設置及其政治地位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 15 張齊顯，〈北京政府外交部組織與人事之研究（1912-1928）〉，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10月。
- 16 張忠紱，〈清廷辦理外交之機關與手續〉、周子亞，〈我國外交機構沿革考〉、劉心顯，〈中國外交制度的沿革〉、劉熊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其海防建設〉，以上四篇均收錄於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五冊，（臺北：正中書局，1956），頁1-55。
- 17 傅宗懋的〈清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軍機處之關係〉，收錄於王壽南、陳水逢編，《清詞論文集》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1-69；劉光華，〈清季總理衙門的職掌〉、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以上兩篇收錄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

外務部，然而僅止於簡單組織介紹。至於大陸方面的期刊論文，諸如馮君〈論清末外交機構的演變及對社會的影響〉、吳國儀〈略論清政府外交機構的演變〉、梁嚴冰、劉蓉〈總理衙門：近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一次重大變革〉、吳福環〈總理衙門與洋務運動〉與〈社會變遷中清政府的一個官員群體——總理衙門中的大臣們〉、楊青雲〈總理衙門與清末社會的近代化〉等。<sup>18</sup>多集中於討論總理衙門與清末政局變化，有助於外務部以前外交環境之建構與認知，然其共同缺點為流於泛論，缺乏細部實證研究，彼此之間的雷同性過高。

有關外務部的專書、研究論文的數量，無論就國內外而言，較之於總理衙門顯得相當稀少。就筆者目前所見，國內外均尚未有專書問世，而臺灣方面可供參考的相關學位論文，僅有陳森霖〈中國外交制度現代化——1901-1911年之外務

---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七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229-366。筆著按，本書內其他篇章關於近代外交之論文亦相當值得參考。

- 18 馮君，〈論清末外交機構的演變及對社會的影響〉，《嘉應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頁46-49、63；吳國儀，〈略論清政府外交機構的演變〉，《外交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頁57-63；梁嚴冰、劉蓉，〈總理衙門：近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一次重大變革〉，《人文雜誌》，1998年第1期，頁117-120；吳福環，〈總理衙門與洋務運動〉，《河北學刊》，1994年第1期，頁96-103；吳福環，〈社會變遷中清政府的一個官員群體——總理衙門中的大臣們〉，《河北學刊》，1995年第5期，頁79-85；楊青雲，〈總理衙門與清末社會的近代化〉，《商邱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頁43-45。

部〉，<sup>19</sup> 其特色在於使用行政學理論，驗證中國外交制度的現代化，甚有創意，但可惜欠缺實証個案研究，以及人事背景的分析，部份敘述過於簡略，亦未能利用外交檔案等作為基礎；任天豪〈胡惟德與清末民初的「弱國外交」〉，<sup>20</sup> 則有部份涉及外務部的相關內容。而大陸方面研究外務部的論文，主要有杜繼東〈清末外務部歷史地位初探〉、張步先〈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兼論晚清外交近代化〉、王開璽〈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芻議〉、趙永進〈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新議〉、丁一〈清末外務部設立與「克林德案」〉等，<sup>21</sup> 惟上述研究所引用的佐證資料，大多數屬二手的轉載資料，作泛論式的評斷，缺乏以一手檔案史料作為研究基礎，同時礙於意識形態的限制，較難擺脫民族意識與古為今用的論述，在理論架構的基礎上有其侷限性。除此之外，目前研究外務部最重要的已發表論文，應屬高

- 
- 19 陳森霖，〈中國外交制度現代化——1901-1911 年之外務部〉，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5 月。
  - 20 任天豪，〈胡惟德與清末民初的「弱國外交」〉，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
  - 21 杜繼東，〈清末外務部歷史地位初探〉，《蘭州學刊》，1990 年第 6 期，頁 72-77；張步先，〈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兼論晚清外交近代化〉，《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 7 月，第 25 卷第 3 期，頁 67-71；王開璽，〈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芻議〉，《河北學報》，1995 年第 3 期，頁 101；趙永進，〈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新議〉，《湖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 年 12 月，第 18 卷 2 期，頁 176-178；丁一，〈清末外務部設立與「克林德案」〉，《文史春秋》，2002 年第 7 期，頁 42-45。

超群〈外務部的設立及清末外交制度的改革〉，<sup>22</sup> 該文基礎為其當年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論文〈論清末外務部〉修改而來的，<sup>23</sup> 文中共分為外務部的設立、內部組織、駐外使節、地方外交機構、結語等五個部分，對於外務部各層面均做了基本整理與考察；不過，作者雖然於各層面均作探討，然而在細部實證研究與外務部各階段之發展過程依然闕如，甚為可惜。

### 三、研究方法

史學界於晚清歷史發展之研究，大多以「政局」及「外交」這兩條脈絡走向為主，關於晚清在政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探討不同的政治集團或人物間的衝突與糾葛；而在此外交體系方面的研究，則又多著墨於對總理衙門、出使大臣等制度層面的探討。不同的研究取向，雖然能獲致較精細扎實的成果，卻也有過於片面論斷與不易整合的遺憾，對於建構自總署迄外務部為止的歷史理解，確有不足。

本文的研究方法，著重於將上述兩條脈絡與相關史料之整合、歸納與比較。首先著重於原始資料的收集，中央研究院近

- 
- 22 高超群，〈外務部的設立及清末外交制度的改革〉，收錄於王曉秋、尚小明主編，《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02-229。
- 23 高超群，〈論清末外務部〉，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論文，1995。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典藏的《外交檔案》內，存有豐富的外務部檔案可供參考。<sup>24</sup> 檔案以外，受限於現存外務部時期的保存資料稀少，尤其是外務部人物活動、異動的部份，筆者以創刊自 1872 年的上海《申報》作為輔助，<sup>25</sup>《申報》詳實地記載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歷程，在當代發揮了引領社會輿論相當大的影響力，誠為研究近代史者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另外，再輔以當時朝野政壇人士的電文、日記、傳記、筆記、回憶錄與《東方雜誌》、《外交報》等史料，交互參酌引用。特別是自清末民初時期所撰述的諸多筆記及野史，對於晚清政壇的紀錄與重新建構人際關係脈絡上，皆有相當珍貴的參考價值。例如，許晏駢與蘇同炳合編的《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蘇同炳的《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劉體智的《異辭錄》、劉厚生的《張謇傳記》與吳相湘的《晚清宮廷實紀》等。此外，已故著名小說家高陽（許晏駢）的相關著作如《翁同龢傳》、《瀛台落日》等系列作品，亦有助於釐清晚清政壇的發展脈絡。<sup>26</sup> 檔案、報章和筆記，三者之間性質各有不同，但在史學

24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尚有大批相關的外務部史料存放，目前正在整理中，不對外開放。

25 陳玉申，《晚清報業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 39-50。

26 許晏駢、蘇同炳編，《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上中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蘇同炳，《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上下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劉厚生的《張謇傳記》，（上海：上海書店，1985）；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臺北：正中書局，1988）；高陽，《翁同龢傳》，

研究上卻能互補，對於歷史的重新完整建構而言，實具有重要的價值。

筆者希冀能透過檔案、史料與相關著作的爬梳和融會，將外務部本身的發展作為整體研究，以較為客觀與實事求是的角度，探討外務部在各階段的發展與人事互動、變遷的真正因素，評估其對近代中國外交之發展意義為何？希冀能填補部份晚清外交史研究的空白，相信對於了解近代中國的外交制度沿革與後續國際地位的變化，應具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

#### 四、本文架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回顧史學界對於外務部之相關研究、成果與其侷限，並對本文的研究取向、章節的安排與架構，作一概略說明。

第二章清末外交機構的變革與外務部的成立。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外交機構之演變，探討清朝外交體制之變革與代表人物。第二節為改革外交之主張，分析戊戌變法前後的改革思潮與主張，包括洋務派、維新派之外交思想，維新派人物在變法前後所提出的外交改革意見等。第三節為外務部之成立，藉由

---

（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3）；高陽，《瀛台落日》，（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6）。

《辛丑條約》第十二款的談判過程，探討成立外務部之意見、交涉與成立過程，以期能完整建構出成立外務部之脈絡。

第三章外務部的組織、人事與經費。分為三節，第一節外務部之組織與變革，探討包括外務部組織的最初設計、組織之變革與業務劃歸之變化。第二節為外務部之人事分析，研究部內丞參以上人員之出身、籍貫、升轉與司員之任用等項。第三節則為外務部之經費分析，探析外務部成立期間之實際收入及支出經費。

第四章出使制度與地方交涉機構。分為二節，第一節為出使制度的變革，探討自總署時期的出使制度發軔與改革、外務部時期的諸項改革措施，以及對於民國時期的影響。第二節為地方交涉機構的設置，分敘交涉使司設置之原因、組織與後續民國時期之影響。

第五章外務部的發展階段。分為三節，主要依據外務部歷任尚書的興替，作為早、中、晚三個不同階段的劃分標準。第一節為早期發展（1901-1907年）：奕劻與瞿鴻禨。第二節為中期發展（1907-1909年）：呂海寰與袁世凱。第三節則為晚期發展（1909-1911年）：梁敦彥與鄒嘉來。本章藉由研究這六位外務部領導人物，進一步探析外務部成立期間，清廷外交機制、政策與組織革新之歷程。

第六章結論，將總結以上各章節的分析與論點，並提出本研究成果。